

後金融海嘯時期的

中國與東亞經濟協作



李思名 薛鳳旋 黃枝連 主編

當代中國研究

後金融海嘯時期的

中國與東亞經濟協作

李思名 薛鳳旋 黃枝連 主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向婷婷

書籍設計 吳冠曼

叢書名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書名 後金融海嘯時期的中國與東亞經濟協作

主編 李思名 薛鳳旋 黃枝連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香港九龍塘聯福道 34 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6 字樓

版次 2012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 開（168 × 230 mm）35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181-4

© 2012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出版說明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是香港三聯書店和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合作出版的第一個重要項目。

由2009年9月開始，這個項目正式起動，我們將聯合出版有關研究中國當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環境等方面的專著、合著、論文集等。這套叢書，設計初期每年出版約十種。除了有選擇地收入浸會大學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外，我們將熱誠歡迎本港及海內外學術界提供資料豐富、有分析、有新見，同時又簡明可讀的有關當代中國包括內地、台灣、港澳及中外關係的研究著作。

期望本叢書可以見證當代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各領域的全面發展及其發展路程中艱難跋涉的印跡。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目 錄

緒論 後金融海嘯時期中國與東亞協作的範式探索 李思名、薛鳳旋、黃枝連

第一部分 新世紀發展範式的理論性探索

中國經濟發展與世界金融危機 林華生 14

中國崛起對日本、韓國及東盟的經濟合作的促進 薛鳳旋、戴荔珠 26

讓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發展系統連接起來 黃枝連 46

和諧世界理念對東亞合作的若干啟示 陳奉林 60

第二部分 轉變中的中國、東北亞和東南亞

六方會談：決策樹模型視角下的獵鹿困境 朱芹 74

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構想——讓韓終浮出歷史的海面 楊萬娟 94

中國—東盟自貿區的邊境效應：基於滇桂對越進出口的實證檢驗 李紅、方冬莉 109

廣西：中國與東盟自貿區的前沿 何亮亮 125

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矛盾與衝

突 周正偉、賴志成 133

中國在東南亞的形象：東南亞網絡論壇關於北京奧運會的幻想主題研究 蕭林佳、吳玫 153

第三部分 東亞協作與台、港、澳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對台灣的影響：兼論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陳尚懋、姜新立 188

亞太地區在“10+1”之後華文教育市場的展望——以台灣在東南亞國家的機會談起 楊聰榮 210

伶仃洋灣區發展協作縱橫——跨越大洋彼岸，從歷史到明天 鄭國強 229

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中的澳門及澳門特區的發展策略 譚筱嫻 241

審視“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與新加坡公共行政改革 鄧木佳 256

第四部分 中國內部的城市和區域關係研究

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格局的新發展 陳廣漢 284

“未富先老”中國城市養老制度面臨的風險與挑戰：以上海為例 陸緋雲 296

金融海嘯、經濟重心東移與東亞房地產泡沫：香港個案研究 李思名 322

要素稟賦、市場結構和澳門經濟發展——澳門經濟發展的回顧、分析和展望 楊正滄 338

緒論

後金融海嘯時期中國與東亞 協作的範式探索

李思名（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講座教授、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所長）

薛鳳旋（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地理系講座教授）

黃枝連（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澳門大學客座研究員）

1. 概述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以強調小政府、大市場、少干預、少規管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思潮，席捲全球。所謂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強調的是經濟自由化；重新建構企業與勞工關係，特別是致力於削弱工會力量和工人集體談判權；減少甚至取消公共住房、就業保障、公費醫療、高等教育資助等社會福利；把過去一般視作公共服務的郵政、電訊、公共交通等服務私有化；並大大減少甚至取消對包括銀行、證券、外匯、跨境資金流通等金融相關行業的規管；致力於促進地方與地方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默許甚至鼓勵金融機構間的併購重組。

與此同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等由美國和英法德等歐洲大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和貿易機構，也不遺餘力地推動全球性資金流動和貿易自由化。為了滿足上述國際組織的規章和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興國家為了強調主權獨立而設置的各種形式的對外資投資以及進出口貿易限制，一一取消。隨着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東歐國家視新自由主義為民主政治的基石，紛紛採納一步到位的所謂“大爆炸”（big bang）式經濟自由化改革。至於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並沒有摒棄共產黨領導，更在“造大造強”的指導思想下，大大加強大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的指導地位，但是，對外資流入的擁抱，加上忽視農民工權益的城鄉二元化的戶籍政策，卻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提供了差不多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

上述發展，讓以西方，特別是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企業，得以建構全球性生產鏈，從而謀取因成本和資源空間差異所產生的利潤機遇，並幫助該等企業打開新市場，以達至全球範圍的生產和銷售的最優化。當然，數碼化、光纖、互聯網、流動通訊等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也為前所未有的經濟全球

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這意味着自20世紀初佔主導地位、以強調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大型工廠為基礎的福特主義（Fordism）生產模式，逐漸被強調垂直解構（vertical de-integration）的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生產模式所替代。後福特主義其中一個主要表現，是生產過程的空間鬆綁。不單決策、研發和實物生產等主要過程出現空間分離，而且，同一生產工序往往被分拆成多個部分，在不同地方以至不同國家進行。

在這個背景下，生產的空間重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在不同的地理尺度展開。城市或地區政府為了推動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往往致力於爭取企業在當地投資設廠。個別中心城市，更致力於吸引包括跨國企業在內的大型企業，在當地設置全球或地區總部。城市間和區域間的競爭因而大大加劇，城市作為經濟主體的地位也因此而不斷提升。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的決策，特別是有關集資、併購以及全球範圍的生產空間配置的決策，集中在有限的城市進行，該等城市可被稱為世界或全球城市。一個以世界性金融中心為主導的世界或全球城市網絡，成為推動和控制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紐帶。在這個過程中，紐約、倫敦、東京、法蘭克福等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撇開“九一一”以及相關的中東地緣政治議題不談，自上世紀80年代中開始，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和經濟全球化，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擺脫了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越戰和石油危機以來的滯脹困擾，進入一個基本沒有通脹、但卻長時間保持平穩增長的繁榮期。當然，在政治光譜處於相當右傾位置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除了為歐美國家帶來的GDP增長，以及進一步鞏固以歐美為基地的跨國企業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外，也大大加劇了包括歐美國家在內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增加了就業的不穩定性。

優質化、可持續的人類社會發展模式，一直以來是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的追求。不過，這是一個永恆的探索。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具體的發展範式，比如人類歷史的幾大文明，直到今天，相關的倫理哲學探討還是具有相當的

現實意義。然而，在西方，雖然大部分人仍然信奉基督教（廣義），但是，政教分離已是一個基本認識。在東方，儒家思想並沒有隨着時代淹沒，今天有不少學者正在探索儒家學說的現實意義及其在中國乃至外國的現代應用可能性，特別是“仁政”概念。可以說，“以人為本”為目標的不斷更替的範式轉移和體制創新是一種常態；也就是說，有關優質化、可持續發展的範式探索，不可以抽離特定時空進行。我們需要的，是“範式轉移，體制創新；以人為本，先行先試”。

由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為長達二百多年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給予了新的內涵和動力，但是，在解決跟福特主義生產模式有關的僵化經濟規條和福利制度的同時，也讓快速、龐大和不受監管的跨境資金流動形成極大的不穩定性，並因此埋下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否定。2008年很可能是當今世界經濟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雷曼兄弟”破產引發的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這不單宣佈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西方經濟超長繁榮期的結束，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標示着過去二三十年以美國為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對推動全球經濟有效性和廣泛被認受性的終結。今天，量化寬鬆政策未能拯救陷於崩潰的美國房地產市場，歐債危機更動搖了歐盟的基礎。不少學者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霸權地位正逐漸衰減，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在新世紀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構過程中，應當扮演重要的角色。

20年前，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提出以中國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四地，組成中華經濟協作系統，並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探討該系統的具體內容和含義。隨着中國內地分別與香港和澳門於2000年代中期簽訂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落實與深化，以及和台灣於2010年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兩岸四地組成的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的次區域合作步上新的台階。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亦於2010年元旦進入運作狀態。兩岸四地和包括中日韓在內的東盟10+3的“東亞

經濟圈”的經濟合作，將更為緊密。在經歷金融海嘯洗禮、西方經濟復蘇還是躊躇不前的今天，包括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在內的整個東亞經濟協作系統的孕育和充實，尤為重要。

歷史上，朝鮮半島與中國封建王朝中央政府出現了不斷的離合關係，最後發展出二戰後的一種大國小國相互尊重的東亞區域秩序。此後，中國一直致力於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的睦鄰關係。但是，東亞各國對中國的重新崛起不無戒心。再者，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跟大部分東亞國家在政治制度上有着根本的差異。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近年更把中國看作假想敵，不斷妖魔化中國，並致力於拉攏日、韓、越、菲等東亞各國與中國抗衡，就有爭議的海域和島嶼大做文章，加上台灣海峽兩岸政府往往把雙方的對抗延伸到東亞各國，這等等事件，對“東亞經濟圈”的建立構成相當大的障礙。

如何理解由於歷史、地理、政治等因素所造成的東亞地區錯綜複雜的政經關係，如何看待包括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澳門在內的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內部的空間競爭和協作，以及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與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相互交流所帶來的廣大機遇、面對的各種制約和挑戰，需從多方面作詳細分析和探討。就此，本書以2010年底在上海舉行的第十三屆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國際會議發表的文章作為基礎，並加入數篇其他相關的文章，從不同的分析角度和地理尺度，審視後金融海嘯時期兩岸四地和東亞地區的政經協作，並據此探索不斷轉變的國際和地區政治和經濟關係下的發展範式。以下為本書的內容綱要。

2. 內容綱要

2.1 新世紀發展範式的理論性探索

本書首先從宏觀的全球視野和歷史發展脈絡，探討後金融海嘯時期的今天全球所面對的問題，以及中國和新興國家未來擔當的角色。這方面的文章有四篇。

日本早稻田大學中華經濟研究所所長林華生教授就如何理解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作出詳細而精闢的論述。林文指出，在後金融海嘯時期的今天，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在國際事務上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個別更提出所謂G2的說法，即由美國和中國主導世界經濟秩序的構想。不過，中國一直堅持只參與包括金磚四國在內更有代表性的G20，以強調新興國家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事務上的發言權。中國也致力於加強本身在WTO和IMF等主要國際金融組織的代表性，以及謀求與周邊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並以人民幣與周邊國家進行雙邊貿易結算，從而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打下穩固的基礎。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教授和他的博士生戴荔珠小姐指出，全球經濟出現新的板塊分裂，也就是說，全球經濟出現新的大轉移。自2008年金融海嘯開始，中國的發展動力由出口轉為內需；而中國也將成為世界金融大國，以及資本和技術的主要出口國。中國的崛起，意味着整個東亞地區將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區域。然而，要建構一個涵蓋整個東亞地區的自由貿易區，東亞各國須克服多方面的問題，領海爭端是其一，多重、重疊的FTA是其二。此外，東亞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缺乏。日本、韓國和中國應加強與第三世界資源國的合作，達致互惠互利的共同發展。

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黃枝連教授《讓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發展系統聯接起來》一文，同樣針對跨區域合作。黃教授指出，中國、印度及印尼三個亞洲大國，在新千年一新世紀必須進行交流協作，這可能是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交流的一件大事；它將涉及中國14億、印度12億、印尼3億人口的生存發展的大計；如果把東北亞、東盟以及南亞其他國家人口算進來，幾乎是40億人口的局面。而使這些地區聯繫起來的，首先是亞洲西南大陸橋發展協作系統。進入21世紀，10+1 ACFTA / 10+3 FTA使西太平洋地區的發展連成一片，並使印度洋地區和西太平洋地區的發展連成一氣，隔洋遙相呼應。

北京外交學院外交學系陳奉林教授引用各方關於東方文化、東方外交、世界近代和現代史的研究及論述，濟之以儒學思想，探索“東亞各國在謀求發展時建立一個新的分析視野”。陳教授指出，在當今高度技術化的時代，東亞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合作與和平思想，是義、利、理的統一；對東亞的和平發展可以發揮古為今用的功效。“和諧觀念不僅應該成為東亞國家共同的精神紐帶，也應成為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財富。”

2.2 轉變中的中國、東北亞和東南亞

這部分的六篇文章，以不同的視野和實例，具體分析東亞地區各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以及中國在東亞所處的位置。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韓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朱芹小姐的文章，探討達致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六方會談如何走出當前的困境。朱小姐指出，怎樣解讀和執行朝鮮半島無核化，在於美國的軍事存在及其對朝鮮的敵視政策與朝鮮安全訴求呈負相關性。六方會談實際上是購買朝鮮放棄核武——一個朝鮮難以在現存國際體系下接受的要求。朱小姐認為，以朝鮮半島中立化機制化解掉朝核問題未嘗不是一個最佳出路。

中南民族大學韓國研究所副所長楊萬娟教授從一段比較遠古的中國與韓國（朝鮮）的歷史着手，探討一個可以利用和挖掘的文化創意產業機遇。楊文從多方考證，與徐福同時期為秦始皇入海求長生不老藥的方士韓終，在兩千多年前，越海到了朝鮮半島東南部辰韓之地；自此，荊楚文化深深影響韓國文化的發展。楊文指出，在文化發揮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的今天，有必要對韓終傳說的真偽進行考證，讓韓終東渡說跟徐福東渡說一樣逐步清晰起來；而開發與韓終有關的文化產品也可以借鑒徐福東渡的經驗，從事電影、電視劇、漫畫、電子遊戲等創作。

廣西大學商學院李紅教授和方冬莉小姐的文章，把探討對象從東北亞轉到

東南亞。他們以嚴謹的計量方法，利用2004–2009年雲南和廣西兩省區對越南的進出口貿易月度數據，分析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貿易的邊境效應。結果顯示，邊境正效應或中介效應的增強，對中國國內邊境省區之間具有整合和穩定的協調作用。滇桂兩省（區）對越經貿處於不同的位置，發揮着不同的作用，並逐步呈現協調的發展。交通設施和服務的改善，進一步削減了邊境的屏障效應，強化了邊境的中介作用。

香港鳳凰衛視有限公司評論部副總監何亮亮先生從宏觀角度，分析廣西作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前沿地位。何文指出，廣西與越南關係密切，在20世紀北越對法國和美國的戰爭中一直作為北越的後方，並為越南培養數了以千計的精英，包括現在的越南總理阮晉勇。今天，廣西各大學有大批越南以及老撾、柬埔寨、泰國等國的留學生。因此，中國決定把廣西首府南寧作為中國—東盟博覽會的永久會址。雖然，廣西作為地方政府無力也無法參與國際事務，包括南海海權的爭議，以及如何具體實施東盟10+1自由貿易區協議，但是，無論如何，東盟10+1已經啟動，其對廣西的正面效應將會持續；而廣西需要的，是能否與廣東形成一個兩廣經濟區。

香港珠海學院周正偉博士和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賴志成博士就馬來西亞為保護和扶持本土馬來族，也就是壓抑當地華人和印度族群而實施了四十多年的新經濟政策，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後東亞區域一體化所產生的矛盾與衝突作了詳細的分析。作者認為，新經濟政策以“馬來人至上”為中心，鼓吹種族主義，違反公平原則。在東亞一體化的今天，新經濟政策的繼續執行，只會使馬來西亞落後於印尼、泰國等競爭對手。

澳門大學傳播系蕭林佳先生和吳玫博士從另一角度——傳媒生態——審視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文章首先綜合介紹東盟國家傳媒生態三十年來的演變；接着利用符號融合理論，就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的網上社群對北京奧運會的討論所形成的幻想主題和幻想類型進行深入和聚焦的探討，包括這些幻

想主題和幻想類型如何與網民群體自身的認同，與他們同中國的複雜關係而演繹不同的場景、角色和行動的版本。

2.3 東亞協作與台、港、澳

台灣、香港和澳門，跟中國內地一樣，為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的組成成員，對推動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整個中華經濟協作系統與東亞地區的協作，以及促使世界政治和經濟版圖的重新繪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有五篇文章。

台灣佛光大學國際與兩岸事務學系陳尚懋博士和姜新立教授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訂做了深入的分析。他們認為，雖然台灣無法經由ECFA進入ASEAN+N的整合模式，但台灣仍然可以透過單點突破的方式，特別是促進深層次的文化交流，拉近與東南亞人民的距離，以避免台灣在東亞區域整合過程中被邊緣化。

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楊聰榮博士就亞太地區建立“10+1”框架後華文教育市場的展望，探討台灣在東南亞的機遇，並提出以文化資源的角度來論述台灣在東南亞發展的優勢。楊氏指出，台灣當局的政策應以鼓勵個人或民間機構到東南亞發展為主，不一定要在外交層面考慮台灣與東南亞國家間的“雙邊關係”。可以說，楊文是姜陳二位文章的具體演繹。

澳門環球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鄭國強先生把目光轉移到珠江三角洲。鄭文回顧了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特區的建立和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的作用，並指出這個戰略性的發展策略有着穩固的歷史文化基礎。港澳回歸後的今天，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粵港澳可以突破各自發展的瓶頸，實現優勢互補，使“伶仃洋灣區”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區域，應對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需要。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譚筱嫻小姐的文章，也是圍

繞着如何確立粵港澳大都市圈的國際地位，把這個次區域打造成東盟10+1區域內的增長極和自由貿易樞紐。就澳門而言，譚文認為，澳門特區政府應積極發揮在粵港澳次區域的角色，突出澳門和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內聯外通作用，把境內的區域合作延伸成為中國在東盟的對外戰略。

跟以上主要以宏觀經濟和國際關係為主軸的文章不一樣，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鄧木佳博士的文章重點放在公共行政，比較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新加坡公共行政改革的異同。港新兩地都是前英國殖民地，然而，兩地的後殖民地歷史有顯著的差異。1997年，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而新加坡則早在1965年便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香港回歸後秉承殖民地時代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更由於《基本法》下缺乏政黨政治支持的所謂行政主導體制，政府認受性經常受到質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動受到相當大的制約。新加坡方面，人民行動黨長時間掌控國家政權，政策改革力求平穩，按部就班地根據社會現況和民意，推行行政改革。

2.4 中國內部的城市和區域關係研究

範式轉移，體制創新，不但適用於整個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的建構，以及跨國意義上的大區域合作，也適用於一國之內各次區域或各城市之間，甚至一個區域或城市內部的交流協作和發展。對幅員廣大的中國來說，這個地理尺度的分析尤為重要。本書有四篇文章論述泛珠三角和滬、港、澳在後金融海嘯的政經格局下所面對的問題與發展的機遇。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教授的《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格局的新發展》一文指出：隨着泛珠三角區域內國家頒佈的多區域發展規劃的實施，泛珠地區很可能形成多極化的區域發展動力機制，多圈層、多極化和開放性將成為泛珠區域合作和發展的重要特徵。加快環珠三角區域的發展將有利於修補珠三角與內地省份在區域經濟發展上形成的“經濟斷層”，從而加強珠三

角對外輻射，建構泛珠區域和內地發展的戰略平台。

實施了30年的一孩政策，雖然大大減輕了中國的人口壓力，但是，卻同時加快了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口老化的現狀尤為嚴重。上海財經大學陸緋雲教授《“未富先老”中國城市養老制度面臨的風險與挑戰：以上海為例》一文，以有力的數據，論述人口老化對上海——中國最大的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帶來的挑戰。陸文認為，單靠上海本身的力量和現有的養老制度及養老模式，實不足以為龐大老年人口提供足夠的服務；人口老齡化直接關係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所以，中國應該把這一挑戰作為國家戰略問題來應對。

房地產泡沫的爆破是導致2008年金融海嘯的直接原因。不過，在美國兩度推出量化寬鬆政策的影響下，包括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在內的東亞地區的房地產市場，很快便擺脫了金融海嘯的困擾，重新進入上升軌；不斷高漲的房價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講座教授、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所長李思名先生的文章，回顧了香港1997年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過程，以及房地產泡沫爆破對國民經濟和社會所造成的巨大和深遠的禍害，並進一步探討了香港特區政府針對新一輪房地產市場泡沫形成的應對措施以及泡沫爆破的可能性。

1999年澳門回歸後，旅遊博彩業在澳門特區政府推動下得到超常規的高速發展。而澳門人均GDP更因此超過香港，排在世界前列。然而，單一結構的經濟存在極高的風險係數；而且，超高速的經濟增長不單未能惠及社會低層，甚至加深了社會矛盾。澳門是東亞地區少數與歐洲大陸，特別是拉丁語國家有深厚歷史淵源的地方。有着濃厚南歐風貌的澳門舊城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廣東當代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楊正滄教授的文章指出，如何利用歷史所賜予的要素稟賦，並加強與香港、珠海和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合作，改善經濟結構，是澳門的當急之務。